

# 从圆文化的发展变迁看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肖慧丽<sup>1</sup> 何星亮<sup>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圆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之一,其历史变迁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更展示了中华民族对于和谐、圆满、包容等理念的追求。通过时空结构分析法,一方面,从历时性角度剖析圆文化如何从单一的物质形态逐渐演化为蕴含丰富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总结圆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另一方面,从共时性角度探讨圆文化与其他领域的互动,分析其在哲学宗教、日常生活、艺术审美及文学作品等多维度的融合与创新,进而揭示其发展变迁过程中所凸显的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深入研究圆文化的发展过程,既有利于了解圆文化的历史,也有利于推动当代圆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圆;圆文化;中华文明;创新性

**中图分类号:**C95 **Doi:**10.19898/j.cnki.42-1704/C.20250221.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25)02-0082-10

## 一、研究缘起

作为世界上独树一帜、历经数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体系,中华文明其生命力之顽强举世罕见。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虽历经外患内忧、列强侵扰的严峻挑战,但始终屹立不倒,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再生能力,且其文化内涵日益丰富、历久弥新。究其原因,这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密切相关。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sup>[1]</sup>“创新性”即为五个“突出特性”之一,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sup>[1]</sup>

从古老的图腾崇拜到现代的艺术创作,圆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符号,跨越时空界限,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圆文化”。所谓“圆文化”,是指以“圆”为象征的各种文化现象,包含“圆之形式”与“圆之意味”两个维度,涵盖物质、制度、行为、精神各个层面,从表现形式上有祭祀之圆、舞蹈之圆、建筑之圆、器物之圆、文学之圆、信仰之圆等类型。其中,“圆

收稿日期:2024-07-20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研究”(2023YZD055)。

作者简介:肖慧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何星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主要研究中华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之形式”,就是所谓的圆形形状。圆可以是平面的,即“由直线构成的,呈 360 度。它意味着流畅、运动、柔润、舒展、活泼、轻松、平和”<sup>[2]</sup>;也可以是立体的,即“由事物旋转运动而形成完美曲线的球体状态,具有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上、下十维空间,象征某种事物的整体性、全局性和广大性,进而可以推衍延伸,如统一、和谐、周期、包容、同化、均质、完满等等”<sup>[3]</sup>。“圆之意味”,则指在圆形基础上所衍生的象征与意义体系,如“天圆地方”宇宙观、“智圆行方”处世观,以及以“圆”为核心的“圆满、团圆、圆融、圆润、圆通、圆转”等语义体系。

可以说,“圆”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深刻认识,也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视觉上来看,无论是圆环、圆平面,或是圆球体,也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造型艺术中,它都能传递出统一完整、稳定平和的审美感受,而且还能引发相应的和谐、愉悦之情和心满意足之感。因此,中华民族对“圆”尤为青睐,最为常见的便是各类建筑、器物中的圆形元素。从古代的天圆地方观念,到后来的圆道观、圆形思维以及圆美艺术,圆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圆与哲学、建筑、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渊源颇深、互动不断,圆文化的发展历程亦充满了创新与变革。本文从历史与现代的双重视角,深入分析圆文化的发展变迁与融合创新,以探究其中所蕴含的创新性及其作用机制。

## 二、圆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发展阶段

远古时期,人类从自然界中观察到圆的现象,如太阳、十五的月亮,逐步形成了对圆的初步认知。自那以后,人们开始将各种器物工具制成圆形,渐渐把“圆”看作完满、稳定、美好的象征,推崇和赞赏“圆”也自然成为古往今来人们审美心理上的一种习惯意

识,由此形成一种“尚圆”“乐圆”“爱圆”的圆文化。

### (一) 远古至先秦:圆形器物的兴起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史前时代的各种创造几乎都与圆形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当时的制作条件比较简陋、制作工艺比较简单,但人们总是力图将每一件器物都制作成圆形,“或整体器形为圆形,或剖面为圆形,或纹饰为圆形”<sup>[4]</sup>。距今约 18000 年前,山顶洞人通过石器钻孔的方式,最早在实物上实现了圆的形态,标志着人类对圆形的认识和利用。山顶洞人死后,其骨架周围也多是用赤铁粉末撒成醒目的圆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陶器时代的到来使得陶器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器具,人们做出了大量圆形的陶器。这些圆形的器物不仅实用,还体现了人类对圆形美的追求。在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遗址中发现的盆、碗、钵、罐、鼎等,几乎所有陶器的器形都为圆形。马厂类型的彩陶是马家窑文化的分支,陶器图案流行四个大圆圈的布局,无论从侧面看还是从上往下看,圆圈的形状都非常完整。

人类早期的聚落遗址可以溯源至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在西安以东的半坡和更偏东的姜寨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村落和墓地,证实半坡人已经会造圆形的房屋。在半坡遗址聚落中心的周围,分布着约 46 户中小型房屋的遗迹,其中房屋基址平面呈圆形的房屋占大多数,约有 31 户。同样,在临潼姜寨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圆形房屋,其数量也较方形房屋更多<sup>[5]</sup>。房屋的类型有半地穴式和地面木架式,平面直径一般约为 5~6 米,也有个别面积较小。半地穴式圆形房屋的屋顶一般是圆形或椭圆形,周边有圆脊;地面木架式圆形房屋更像尖锥形,类似当今的“蒙古

包”。这不仅是技术与观念上的创新,更是人类思维对自然形状抽象认知的体现与应用,表明中华文明在物质文明领域的不断探索。

同属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多种玉器,除了一些动物的造型外,其中绝大多数如环、佩、玦、琮、璜、璧等皆为圆形,璧是中间有圆孔的圆形盘状物,而琮则是内圆外方的管状物。现藏于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的龙凤玉璧,年代约属春秋战国时期,其身由青白玉制成,其型由三个同心圆组成,最里面的圆内有一镂空透雕的蟠龙。蟠龙屈身盘绕,头尾相接,构成一个中空的圆;第二层圆圈内是蟠螭纹。蟠螭纹疏朗开放,方中有圆,几乎接近抽象;最外面一圈是云纹,有一种旋转动感<sup>[6]43</sup>。在河南洛阳附近的二里头也出土了大量的玉器,所属年代大约相当于夏代和商代早期。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的玉器中,最大的一件是一把七孔玉刀,长60多厘米,宽9.5厘米,刀背处有七个等距离的圆孔。事实上,考古学家在各地都发现过古代玉刀,而且刀背处都有不同数量(奇数)的圆孔<sup>[6]41</sup>。这一时期的“圆”有比较鲜明的宗教性、政治性和象征性,与早期的图腾崇拜有关。

## (二)秦汉至隋唐:圆道哲学的发展

进入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逐步迈入一个成熟且稳定的封建社会阶段。在此背景下,历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碰撞的“圆”观念,开始跨越原有的圈层界限,在社会各领域内广泛传播。此“圆”概念不仅蕴含宇宙自然的和谐秩序,亦象征着人际关系的圆满与均衡,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的关键要素。儒家与道家,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思想流派,各自对“圆”赋予了独特的理解和诠释。儒家视“圆”为道德完善、人格圆满的标志,推崇中庸之道,追求内在修养与外在举止的和谐统一;而道家则从自然法则的

角度出发,将“圆”视为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终极形态,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智慧。

秦代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圜道》记载:“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sup>[7]</sup>此篇提出了天道循环的理念,并将天道之圆应用于阐释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进一步将“圆通”境界与“道”的概念结合,构建了“圆道”的哲学范畴。刘长林认为:“圆道即循环之道。圆道观认为宇宙和万物永恒地循着周而复始的环周运动,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的发生、发展、消亡,都在环周运动中进行。圆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之一。”<sup>[8]13</sup>并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有许多,而圆道观念是最具代表性的之一。”<sup>[8]25</sup>圆道观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自东汉末年至南北朝,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一段政治动荡、战争频仍、国家长期分裂的时期。在这三百余年间,社会生产发展相对缓慢,思想领域的创新与变革亦不及两汉时期活跃。然而,佛教的传入推动了哲学思想的发展,引入了圆美、圆融、圆相等观念,并带来印度、中亚地区的雕刻、绘画艺术。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其种种以圆为美的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中积淀的圆道思维相互参照,共同加速了圆的美学化进程。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还促使石窟、佛像、壁画等中国建筑艺术由汉代的质朴转向

更为成熟、圆润的风格。

### (三) 宋元至明清:圆美艺术的繁盛

宋元时代标志着中国文化的一次深刻转型,在此期间,圆文化实现了更为深远的发展与广泛运用。在艺术创作层面,宋代工匠更加注重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表达,圆形构图成为他们表达和谐美学的一种核心技法。这一时期的园林艺术追求“曲径通幽、循环往复”的境界,园林布局和景观设计往往以圆形或曲线为主,如圆顶的亭子、月洞门、拱桥等,营造出悠远、神秘的意境,体现“圆”的和谐与统一。宫殿和庙宇的建筑设计亦常采用圆形元素进行装饰和布局,如圆形穹顶、藻井、佛塔、坛城等,增添建筑的庄重感和神圣性。在书画作品中,圆形元素常被用作构图的一部分,如圆形构图的山水画、花鸟画等,通过圆形的运用来增强画面的整体感与艺术感。宋朝诗词中虽然不直接以“圆”为主题进行创作,但诗词中蕴含的意境和情感却常常与“圆”的意象相呼应。例如,北宋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词不仅描绘了月亮的圆缺变化,也寓含人生哲理,即世事难全,应珍惜眼前。南宋辛弃疾《满江红·中秋寄远》:“但愿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别。”借中秋圆月表达对团圆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抒发对离别的感慨。

哲学范畴内,宋明理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思想观念,也显现出对圆的尊崇。著名的《太极图》原本出于道教,后由周敦颐改造定型。周敦颐不仅用一个空白圆圈来表示太极,而且运用“圆”的图式制《太极图》。既在表现形式上突出“太极”之圆美,又从内在实质上将“圆”的思维内蕴于《太极图》《太极图说》的逻辑之中,体现了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之圆理<sup>[9]</sup>,进而创造了“太极”这一万物化生、周流运转、和谐贯通的圆融境界。朱熹

在《太极图说解》中指出:“○者,无极而太极也。”<sup>[10]</sup>“无极而太极”意为无形而有理,“无极”是对“太极”状态的描述,“太极”是天地万物化生的母体,其存在是无声无息的。“无极而太极”揭示了“太极”的混沌状态蕴含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他在《〈周易〉本义》中又说,“太极只是一个浑沦底道理”<sup>[11]</sup>。圆是包罗万象的宇宙模型,“浑沦”正是一种圆形的性状或形态,可以说圆已经上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

从先秦到六朝再到两宋,圆从单纯的几何形状发展为被赋予深厚内涵的哲学符号,从形而下被提升到形而上,被思想家们赋予了“日益幽邃的思辨色彩和日益绵远的哲学意味”<sup>[12]</sup>。与之相伴随的是,圆在美学艺术上的应用也迎来繁盛时期。

### (四) 近代以来:圆文化的多元与焕新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崇尚和谐,以圆为美、以圆为范,体现为人的外在和睦与内在谦逊,这一处世哲学至今仍是许多人的行为准则。在当代,除思想观念、处世哲学等精神层面的延续外,圆文化还展现出多元化与融合性的发展趋势。

现代设计广泛吸纳圆形元素。一是建筑中的圆形符号被重新解读与重构,催生了富有时代感与创新性的作品,如国家大剧院、鸟巢、广州圆大厦等,其圆形外观不仅具备美学价值,还优化了空间布局,增强建筑的实用性与观赏性。二是金融业中,圆成为重要的设计灵感来源。如中国银行的标志设计,设计师靳埭强以圆形为框架,中心留设方孔,并辅以上下垂直线条,巧妙构成“中”字的形态。这一圆形设计不仅象征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更蕴含着中国银行作为全球化金融机构的开放姿态,寓意其业务覆盖广泛,服务通达世界<sup>[13]</sup>。后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标志也都采用了圆形设

计。三是文化产业中,圆形元素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创意设计。中国高校早期的校徽设计多倾向于借鉴欧美高校的模式,以盾形为模板,如北洋大学堂、建校初期的南开大学等。而时至当代,中国大多数的高校校徽设计已转向圆形元素,这一转变深刻反映了圆在中国传统审美意识中的独特地位。中国人自古以来便秉持“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智圆行方”的处世观念,一年四季的循环往复则进一步塑造了中国人对时间循环的独特认知与历史观念。由此,在徽章设计理念中,国人逐渐采用圆形而非西方惯用的盾形元素,诸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徽皆是如此。

非遗文化在当代亦焕发出新的活力,2024年12月4日,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吃团圆饭,挂起象征团圆的红灯笼,这些构成了春节最为喜庆的元素。从“团圆”的形态中提炼出的圆形符号,象征着围聚与圆满,成为以“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图腾。“十二度圆皆好看,其中圆极是中秋”,中秋之夜的满月不仅是自然之美,更是人间团圆的象征,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循环论与贵圆哲学”<sup>[14]</sup>的土壤之中。作为仅次于春节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正是源于对“圆”文化的尊崇。古人将月圆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中秋节又被称作“团圆节”。早在2006年,中秋节就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入选的还有另一圆文化的代表——圆圈舞,流布于贵州、广西、湖南等地的苗族芦笙舞(锦鸡舞),分布于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地的藏族锅庄舞(玉树卓舞),以及2008年入选的分布于湖北、湖南、重庆等地的土家族摆手舞等,尽管都属围圆而舞的形

式,但不同舞种的表演方式却有差异,展现出圆文化在中华各民族中的多元发展。

从上述圆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发展变迁中,不难看出其在物质与精神多层面的发展与创新。从远古物质形态的圆形器具,到逐渐被赋予丰富内涵的圆形思维、圆道观以及成为美好和圆满的象征,圆不仅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愿望,也逐渐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 三、圆文化的跨界互动与融合创新

圆在中华文明中举足轻重。它不仅是圆满无缺、和谐对称的象征,更深深融入哲学思辨、生活习俗、艺术审美乃至文学作品的精髓之中,这种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正是中华文明不断创新、勇于突破传统的生动写照。

#### (一) 哲学宗教中的圆形智慧

林少雄曾指出:“圆在作为人们的审美范畴前,它首先是一个哲学范畴。”<sup>[15]</sup>中国的哲学是圆的哲学,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是圆的哲学精神。

中国人关于圆的哲学的理论渊源,在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载。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是《易经》。《周易》以乾卦为首,而《说卦》云“乾为天,为圆”<sup>[16]614</sup>,从根本上确立了圆对于宇宙发展的意义。孔子《易·系辞》对宇宙万物的发展有更进一步的阐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sup>[16]578</sup>说明了天体运动是周期性的。圆是时间的轮回,也是生命的起止。究其一生,每个人都在重复着圆形发展规律,人的一生是一个圆形的闭环,人的一呼和一吸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可以说,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轨迹都是圆。就哲学层面而言,圆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运动不息、万古不灭,圆是最大、最广、最深、最高的无境之境。

佛教崇尚圆相之美、圆满之美、圆转之美、圆活之美、圆成之美、圆浑之美、圆熟之美、圆照之美,这些美学观念极大地丰富了圆的内涵。佛教的“轮回”与“因果循环”观念与圆形思维如出一辙,诸多至高境界亦以“圆”为象征,如“圆觉”被赋予如来藏、真如、佛性等至高境界的寓意,圆通大士则成为观世音的别称。在禅宗修行中,“圆相”作为参禅的辅助工具,通过在地上或空中绘制圆圈,以象征“启示”,体现“人性与原始本质的完美结合”<sup>[17]</sup>,这与基督教的“十字架”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独特的宗教仪式与哲学思考。佛教尤为推崇圆智,这一概念经学者深入阐释,发展成为一套系统而深刻的思维方法论。在佛教语境下,圆极、圆觉等词汇均为崇高赞誉,而圆通与圆融则为核心术语,前者寓意周遍无碍,后者则强调和谐统一,二者共同揭示了万物相通、无有差别的至高境界。

儒家学说中的“中庸”之道,如“过犹不及”“不偏不倚”,亦蕴含了“圆”的哲学思想,培育了中华民族温和包容、和谐共处的精神特质。史伯在《国语·郑语》中关于五材的论述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sup>[18]</sup>这句话强调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谐创造原则,即“同一”是不能永久连续存在的,结合“不同”的元素使它们平衡、和谐方能促进事物的发展,这与“圆”所代表的圆满、无碍理念相契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事物只有不断地发展,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而事物发展的原则是“和”。因此,“和谐”即意味着“圆满”,进一步印证了“圆”作为思维与文化的重要象征。

从哲学视角观之,人类文明的进展、思维模式的演变以及理性认知的深化,均与圆形及其认知应用的不断发展紧密相连。

## (二) 日常生活中的圆形应用

“圆”已然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与精神追求的显著标志。在行为处事上,人们追求“圆满”;节庆时刻,人们渴望“团圆”;理想实现,谓之“圆梦”;言语表达,讲究“字正腔圆”。

生活中,各类日用器具频繁地以“圆”的形态呈现。从烹饪必备的锅具到餐桌上的碗盘杯盏,无不彰显着“圆”的普遍。筷子作为生活中常见的餐具,其设计也蕴含了深刻的象征意义:一头方形,寓意“地”;另一头圆形,寓意“天”。这种“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在筷子这一日常物件上得到充分体现。所谓“民以食为天”,这种设计理念正是对这一观念的生动诠释。同样,箩筐的上圆下方、椅子的靠圆座方、火盆的外方内圆、灶的方与锅的圆,以及象棋围棋中棋盘与棋子的方圆对比,都深刻反映了“天圆地方”的造物哲学。

与西方惯用的方桌相比,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更倾向于使用圆形餐桌。圆桌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中国人使用圆桌的记录最早可追溯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圆形案几由游牧民族传入中原。随着时代的变迁,圆形案几逐渐演变为当今的高脚圆桌。这一设计不仅是中华民族“团圆”观念的浓缩,也是对“天圆地方”哲学思想的继承,更是阴阳学说的具体体现。圆桌还象征着政治体制中的“外儒内法”,以及为人处世中的“外圆内方”。其中,“天”与“圆”象征着运动与变化,“地”与“方”则象征着静止与稳定,两者的结合正是阴阳平衡、动静互补的体现。

经济生活同样离不开“圆”,圆是中国现代货币单位的文化基础。中国古代货币史上,除贝币外,还有布币、刀币、圜钱以及方孔圆钱四大体系。其中,方孔圆钱其形制沿用了长达两千多年。在东周列国以前,中国古代钱币的形状有许多种。秦统一六国后,将

“圆钱”(多为圆形圆孔)作为钱币的基本形状,并将原先的圆孔改为方孔。自此以后,中国古代基础货币就定型在外圆内方的形状上,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铜圆首先在广东问世,并很快成为市场上通用的基本钱币。人们将这种新型的货币称为“铜圆”,强调其圆形的形状,传承了“天圆地方”的中国传统观念。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一角、五角、一元等硬币仍沿用圆形之状,纸币则以“圆”作为货币单位(虽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写作“元”,但历版人民币上的货币单位都印作“圆”)。

从饮食到货币,从日常生活到经济流通,“圆”的符号总是遍布其中,这不仅是对美的追求,更是对和谐、圆满生活状态的向往与表达,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态与精神追求。

### (三) 艺术审美中的圆形表达

清代张英于《聪训斋语》中指出,“天体至圆”,并强调“万物做到极精妙处,无有不圆者。圣人之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艺一术,必极圆而后登峰造极”<sup>[19]</sup>。在“圆道”思维模式下,中国人以“圆”为标准来评判人生轨迹、人格修养及文艺创作,并将宇宙观与人生观的体悟融入艺术创造,构筑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圆美学”体系。此美学体系强调艺术作品能够展现出圆浑之美,与造化之道融为一体时,其气韵方能生动,实现圆通、圆满与圆活的和谐统一,铸就艺术表现的圆融浑厚之境。

中国的舞蹈艺术深谙“圆”之美。古典舞堪称“划圆艺术”的典范,其精髓在于将“圆”这一元素贯穿舞蹈动作的始终。针对古典舞,人们常以“行云流水”“曲折婉转”等词汇赞誉,这些形象化表述实则凸显了舞蹈动作中“圆”的核心特征。秧歌亦是“圆形艺

术”的典型,在《中国民间舞蹈》一书中,何建安指出:“山东海阳沿海一带的南路大架秧歌,当双队圆场时,交错对舞,舞队形成多中心,在总规律中犹如太阳系中的各星体,自转中有围转,围转中又有绕转。这种成圆成方循规守矩的场位构图是遵循汉民族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传统观念而成的。”<sup>[20]</sup>戏曲艺术里,“圆”是其形式美表演的基本法则,这一法则渗透于戏曲表演的方方面面:演员唱腔追求“字正腔圆”,即声音要圆润饱满;演员在舞姿形态上的手臂、肩膀的弧度亦需精心呈现“圆”的美学特征,即腕部与肘部、肘部与臂部之间的角度需被精细调控在90度至180度之间;演员动作的过渡路径亦需遵循“圆”的原则,即便是跨腿、云手这类最基础的身段动作,也要求呈现出“圆”的形态。

这种对“圆”的偏好不仅体现在舞蹈艺术上,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建筑艺术。在中国古代建筑的语境下,“天圆地方”的理念构成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从秦始皇陵的方形陵台配以象征大地的“方土”,到明代皇陵地宫中圆形的宝顶,再到建筑中广泛应用的方形砖瓦与圆形梁柱,乃至明清北京天坛与地坛的建筑布局,无不遵循着“天圆地方”的设计原则。这一原则不仅体现在空间形态上,更蕴含了深刻的数理文化,进而衍生出“外圆内方”与“外方内圆”两种独特的构造模式。在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方形亭与环形廊、方形门与圆形窗、方形庭院与圆形水塘等元素巧妙结合且被广泛运用,象征性地传达着“天圆地方”的哲学理念。民间百姓亦遵循此“天圆地方”观念,在构建方形小院后,常于院中添置圆形水池,若条件所限,则于院墙上开凿圆形月门以代之,这些均为“天圆地方”思想的重要物化表现。

可以说,历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国审

美艺术早已打上了“圆美”思想文化的烙印。这一传统不仅塑造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貌,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与审美取向。

#### (四)文学作品中的圆形结构

在文学的殿堂里,语言的圆润之美尤为受到推崇。在探讨文学作品的多个维度,如意蕴、情感、体式、风采、结构、韵味、哲理及视界时,古人常以“圆”为标尺,赋予其独特的美学定义。这种以圆为基础的构思,体现了全面审视世界的智慧,并作为激发艺术创造力的手段而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

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圆”字频现,除去《原道》《定势》《隐秀》三处仅指物理形态上的“方圆”外,其余皆蕴含了周全、完备、丰盈及成熟等正面评价,成为褒扬艺术成就的重要词汇。如《体性》篇中将文章风格划分为四对八体,其结构本身即构成圆形的分布格局。要达到这种风格境界,需“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sup>[21]303</sup>,意指沿着根本追溯枝叶,思维随之自然圆转。八种风格虽各有特色,但通过融会贯通,可形成一个整体,正如车轮般辐辏相成,彼此协调。这种将风格的熔铸与会通视为圆形或环状轨迹并转喻为轮式结构的审美思维方式,使得叙事作品在横向组合各种情节时,思维取向呈现出旁逸斜出与曲折变化的特点,从而在一个纵深且凝聚的潜在圆形结构上,实现智慧的升华、意义的延伸以及境界的圆满。其他篇章如《论说》有言:“义贵圆通,辞忌枝碎”<sup>[21]248</sup>;《熔裁》记载:“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sup>[21]339</sup>;《声律》曰:“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sup>[21]345</sup>;《丽辞》道:“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sup>[21]366</sup>;《指瑕》指出:“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

虑动难圆,鲜无瑕病”<sup>[21]380</sup>;《知音》指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sup>[21]409</sup>;《明诗》指出,“自商暨周,雅颂圆备”<sup>[21]179</sup>,“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sup>[21]183</sup>;《比兴》曰:“诗人比兴,触物圆览”<sup>[21]370</sup>;等等。这些皆是从圆的标准对诗文作美的规定。

深入剖析中国叙事文学的内在结构,不难发现,“圆”的意象贯穿始终,它映射了中国人追求和谐统一的审美理想。基于对宇宙与生命体验的深刻理解,中国人倾向于寻求与自然、宇宙间的和谐共生,这种“趋圆性”也深刻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创作,促使作家们不断探索并追求圆满而融通的艺术境界。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多层圆形结构尤为常见,如《三国演义》便是一个宏大的圆形叙事典范,通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理念,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框架,并在此框架下,细腻展现了多个层次的圆形叙事单元,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sup>[22]</sup>。不仅如此,从通俗小说、民间故事到戏剧曲艺,甚至口耳相传的传说,无论过程如何曲折,其结局往往指向皆大欢喜、团圆美满的普遍主题,这一模式几乎成为传统文学创作的标志性特征,尤以戏剧中的“大团圆”结局最为典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虽为爱情悲剧,却以“化蝶”的圆满幻想给予观众心灵上的慰藉。

简而言之,中国文学深受“圆”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从诗词文赋到戏曲小说,无不遵循着以圆为范的创作原则,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学追求与文化底蕴。

#### 结语

数千年来,圆文化经久不息,这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分不开。从发展历程来看,圆文化先后经历了远古至先秦时期圆形器物的兴起、秦汉至隋唐时期圆道哲学的发展、宋元至

明清时期圆美艺术的繁盛以及近代以来圆文化的多元与焕新等数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

在远古至先秦这一阶段,原始人类开始对圆形有了初步认知并将其应用于制作圆形器物,从考古发掘的圆形房屋、工具、玉器及祭祀坑等可以看出,圆形是当时器物制作的主要形态,标志着圆文化的初步萌芽。秦汉至隋唐时期,儒家和道家思想开始深入影响圆文化的内涵。《吕氏春秋》提出的“圆道”现象,将圆形与宇宙运行规律、人生哲理相结合,为后世圆文化的发展奠定深厚的哲学基础。进入宋元时期,圆形的意象在建筑、绘画、诗词和园林等艺术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同时,太极图被诠释为圆形则进一步加深圆文化的哲学底蕴,推动圆美艺术的繁荣发展。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交流,圆文化在设计领域展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从国家大剧院、广州圆大厦等现代建筑的设计,到中国人民银行等标识的设计,再到高校校徽等文化符号的采用,以及凝聚圆文化内涵的节日、民俗等传统文化申遗的成功,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审美价值,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桥梁。

从圆文化与其他领域的互动与融合来看,圆在宗教、哲学中的应用不仅丰富了二者的内涵,也展现了人类对宇宙和谐的追求。圆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被抽象化为哲学与宗教的核心理念,跨越物质世界的界限,创造性地贯通精神与物质、有限与无限。日常生活中,通过对圆的创新运用,人们不仅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还通过艺术化处理为器物赋予“天圆地方”“外圆内方”等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艺术领域,圆是书法、技艺、舞蹈、建筑等多种艺术形式中的重要元素。这种以圆为美、以圆为范的审美标准的创新,不仅丰富了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还深

化了圆的应用领域与美学范畴。在文学中,圆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的使用上,更体现在叙事结构的构建中。《文心雕龙》中提出的“圆照”“圆通”等,强调了文学作品的圆融贯通与全面洞察。圆形叙事结构,如环形叙事、轮回叙事等,则通过时间或空间的循环,增强故事的层次感与哲理性。其创新性在于,文学创作者利用圆的循环性,构建一种超越线性时间的叙事模式,使读者在重复与回归中体验到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与思想启迪。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创新精神是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在当代社会,圆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以“同心圆”为象征的民族团结、包容合作等理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sup>[23]</sup>同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sup>[24]</sup>2024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着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sup>[25]</sup>同年1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凝聚一切积极力量,画出海内外支持‘一国两制’事业的最大同心圆。”<sup>[26]</sup>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圆文化所包含的团结、和谐和包容等理念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它启示我们,在追求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同时,更应注重文化的共同性与包容性,通过深入研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推动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智慧与力量。未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精神需求的日益增长,圆文化必将在更多领域绽放出新的光彩,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 2023-06-03 (1).
- [2] 王明居. 王明居美学文选[M].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31.
- [3] 马建勋. 圆点哲学[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34.
- [4] 林少雄. 人文晨曦: 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218.
- [5] 池田雄一. 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M]. 郑威,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38-41.
- [6] 王斌明. 中国艺术史[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 [7] 吕氏春秋[M]. 高诱, 注. 毕沅, 校. 徐小蛮, 标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63.
- [8] 刘长林. 中国系统思维: 文化基因探视(修订本)[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9] 袁宏. 周敦颐理学美学思想研究[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4: 70-71.
- [10] 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11.
- [11]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929.
- [12] 王先需. 王先需文集: 第 6 卷[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85.
- [13] 黎英. 世界经典标志设计[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9: 182.
- [14] 许兴宝. 文化视域中的宋词意象[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113.
- [15] 林少雄. 洪荒燧影 甘肃彩陶的文化意蕴[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9: 117.
- [16] 金景芳, 吕绍纲. 周易全解(修订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17] 汉斯·比德曼. 世界文化象征辞典[M]. 刘玉红, 等,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437.
- [18] 国语[M]. 韦昭, 注. 明洁, 辑评. 金良年, 导读. 梁谷,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40.
- [19] 张英, 张廷玉. 父子宰相家训: 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M]. 江小角, 陈玉莲, 点注.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5: 23.
- [20] 何健安. 中国民间舞蹈[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0: 14-15.
- [21] 刘勰. 文心雕龙[M]. 陈书良, 整理.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 [22] 杨义.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521.
- [2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 (2).
- [24] 习近平. 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9-22 (2).
- [2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4-09-21 (2).
- [26] 习近平.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4-12-21 (2).

(责任编辑 程 苹)

**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echnology to ethnolog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0 and 2020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in Shenzhen, we conduct ArcGI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high/low clustering analyses of the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s to outline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spatial inter-embedding patterns of ethnic populations in super-large cit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from 2010 to 2020,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in Shenzhen has shown increasingly higher spatial concentration. Per capital disposable income exhibits weak spatial clustering, while the tertiary industry shows a certain degree of clustering, particularly in the ethnic catering sector, which demonstrates strong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In contrast, per capital GDP and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re in a spatially dispersed state, with insignificant auto-correl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GIS technology in the study of urban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s provides spatial technical support for constructing an inter-embedded social structure among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super-large cities;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s; inter-embedded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munity environme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patial concentration

## 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 Survey Based on the Immigrant-Type F Community in Eastern Guizhou

CHEN Lin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Guizhou,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immigrant-type F community in eastern Guizhou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It analyzes the endogenous needs of relocated people after immigration and the practical effects of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creating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or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e one hand, as they migrate from impoverished mountainous areas to urban communities, they objectively need to strengthen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to better adapt to their new lives - from a familiar society to a stranger society, from traditional self-sufficient agriculture to market-oriented employment, and from farmer identity to citizen ident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formula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rules,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activity platforms, and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life fiel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meet the endogenous needs of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for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prompting them to “hug together tightly like pomegranate seeds”. The positive exploration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F community provide useful lessons for carrying out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creation work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creation; embedded community

## The Innovativen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ircular Culture

XIAO Hui-li<sup>1</sup>, HE Xing-liang<sup>2</sup>

(1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elemen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ircular culture reflects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the Chinese nation's pursuit of harmony, completeness, and inclusiveness. Using a spatial-temporal structural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examines,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how circular culture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 singular material form into a cultural symbol rich in spiritual connotations,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ircular culture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On the other hand, from a synchronic perspective, it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of circular culture with other fields, analyzing it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daily life, artistic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works, thereby revealing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ighlighted during it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ircular culture not only helps to understand its history but also promot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ircular culture. 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ing a communi-

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circle; circular cul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innovation

## Building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Multinational Shar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Experience of Diqing

WANG D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co-creation, sharing, and empathy among multiple ethnic groups have bec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as practical experiences for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building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har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mong multiple ethnic groups highlights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form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inheriting communities, regional environments, and social life, showcasing the shared aspirations and diverse lifestyles in constructing a common home. The practice of shar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Diqing to build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interactions and integration, as well as a result of the mutual learning and shared prosperity among multiple ethnic groups. It reflect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action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ng an effective and tangible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cusing on the people,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e prioritized. The “second combin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o advance interactions and integration based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enhancing commonalities and embracing differences, we can consolidate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ilding facilitie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experie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expand innovative spaces for our home, while shar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can cultivate a sense of home. This enriches the carrie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onstructing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deepens the connot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context. The shar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inherent gene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cultural resources and life scenarios that promote ethnic unity,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reby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aring; building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Diqing

## The Path to Systematic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Yellow River “Jiziwan” Area

QUAN Xiao-guo

(Inner Mongolia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Inner Mongolia, Ordos, 017000, China)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Jiziwan” (zigzag bend) area features diverse topography and landforms, and is rich in ethnic cultures. Historically, it has been a cultural intersection where various ethnic groups have closely interacted and integrated. This has led to the regio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eing characterized by both uniqueness and commonality, as well as by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erving as a vivid testament to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efforts, the Yellow River “Jiziwan” area has actively followed the national pace and undertaken significant work in this regard, achieving commendable result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notable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overall protection, lack of collaborative efforts among similar projects,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the 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or resource integration among the main bodies of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adequat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with related industr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Yellow River “Jiziwan” area needs to implement systematic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enhancing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heritage projects, optimizing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mong similar projects, focusing on cultural ecological balance, promoting win-win cooperation among heritage protection entit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ractive support of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Keywords:** Yellow River “Jiziwan” are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atic protection;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